

民国孕育时期的少数民族新闻业

白润生,荆琰清

(中央民族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北京 100018)

摘要:自19世纪90年代开始,维新运动兴起并逐渐活跃起来,资产阶级改良派掀起了第一次国人办报高潮。受这一思潮的影响,少数民族报人也积极投身到这场文化运动中来,使得少数民族新闻事业在这一时期产生并蓬勃发展起来。从少数民族报人的新闻活动、少数民族报刊、海内外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报纸3个方面对民国孕育时期的少数民族新闻业进行了研究,认为这些不同少数民族报刊的创立为民国创立后的少数民族新闻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关键词:中华民国;少数民族;新闻业;少数民族报人;少数民族报刊;少数民族文字报纸

中图分类号:G219.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15)02-0073-19

南京师范大学民国新闻史研究所所长、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华民国新闻史》首席专家倪延年教授认为,孙中山1893年7月起在澳门参与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个反对清朝政府的新闻报刊《镜海丛报》(汉文版)有关活动是以“反清革命”政治属性为本质特征的民国新闻业的起源。他的这一观点我们赞同。我们将从1893年到1912年元旦前这一历史阶段称之为民国新闻业的孕育时期。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它发展的基础,中华民国时期的少数民族新闻业也是如此。就中华民国时期的少数民族新闻业而言,其发展的基础就是早在民国孕育时期就已经诞生和缓慢发展的少数民族新闻业。要研究民国时期的少数民族新闻业,弄清民国时期少数民族新闻业的发展轨迹,就不得不首先厘清中华民国诞生之前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业的起源和发展。

一、第一批少数民族报人的新闻活动

伴随着中国汉文报刊的兴起和发展,中国的少数民族语文报刊也很快兴起和发展起来。而在中国少数民族语文报刊兴起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第一批少数民族报人起了极其重要的先驱者和探索者的作用。他们中的重要代表及其办报活动大致如下:

(一)满族报人英敛之的办报活动

少数民族报人的办报活动始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6月17日英敛之(满族)在天津出版的《大公报》。《大公报》是当时最具影响力的资产阶级报纸,同时也是迄今中国发行时间最长的汉文报纸。当时正是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赔款之后,民族灾难深重,受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影响的英敛之倾向于维新。他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4月24日

收稿日期:2014-11-0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3&ZD15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3AXW00)

作者简介:白润生(1939-),男,北京市人,中央民族大学教授,中国新闻史学会特邀理事,中国新闻史学会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名誉会长,南京师范大学民国新闻史研究所特约研究员。

从上海回到天津。在天主教友、资本家柴天宠^①的帮助下,决定以集股的形式,着手筹办《大公报》。

英敛之(1867~1926),1867年生于北京^②,名华,字敛之,号安蹇,满族正红旗人,清末极具影响的大学者,曾创办辅仁大学。满姓赫奢礼,本名赫奢礼·英华。英姓是慈禧所赐,英敛之的夫人是具有皇族血脉的爱新觉罗·淑仲。清朝灭亡后,他把复杂的姓氏取消,只留英华。幼年家贫,他靠自修博览群书,并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他在《也是集·自序》中说:“仆以一武夫,不屑于雕虫刻篆,顾石可掇三百斤,弓能挽十二力,马步之射十中其九,每借此自豪,然此等伎俩,见遗于社会,无补于身家,遂弃之。弱冠后知耽文学,则又以汩滥百家,流览稗史侈渊博;甚至穷两月之目力,读《四库提要》一周,亦足见其涉猎之荒矣。”他少年习武,目的是为了加入军籍,得粮饷,也是生活所迫,不得已而为之;22岁时信奉天主教,和外国神父关系较好,懂法文,曾充当驻云南蒙自领事馆的馆员。他接触到一些西方资产阶级社会的政治学说,了解那里“民权充盛,民智开通”,因此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民主思想,变法维新,使国家逐渐富强起来。1898年,在康有为“公车上书”之后,他曾写过一篇题为《论兴利必先除弊》的文章,支持康有为,并称赞康的变法建议“实今日之顶门针,对症药,痛快切当,言人所不敢言”。他大胆将北京谚语所说“皇上是傻子,王爷是架子,官是婊子,兵是苦子”的话加以诠释。变法失败后,他先潜至天津,后搭重庆号轮船去上海。他仍然支持康梁变法维新的思想,并在光绪二十五年(1899)8月26日出版的《知新报》上发表文章《党祸余言》,对变法的失败表示“感痛郁结,情不能已”,对康有为、梁启超的遭遇寄予深切的同情,并对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封建顽固势力再度训政表示极大愤慨,对他们上台后所掌握的国家命运和前途深感忧虑。英敛之不畏强暴,敢于仗义执言的思想境界,是他后来创办《大公报》的主导思想之一。

1. 初创时期的《大公报》以“敢言”著称

英敛之办报的宗旨十分明确:“采纳西方思想、启迪民智、开风气之先。”《大公报·序》写道:“报之宗旨,在开风气,牖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兹当出版首期,窃拟为之序曰:忘己之为大,

无私之谓公,报之命名固已善矣……”报头上还有法文“L' IMPARTIAL”字样,意为“公正无私”。在英敛之看来,《大公报》应该是一张忘己无私的报纸。该报初创时期采书册式,整版直排,分上下两栏,两栏皆加有边框且之间留有空白,对折之后可装订成册。每日出8至16页,除报头^③和广告^④占3面外,刊登上谕电传、中外近事、宫门邸抄、路透电报、时事要闻、论说、译件、附件等。国内大中城市有其代表处65个,在南洋、美洲、日本等地也有代销点。创刊第一天即销售3800份。一时间,天津《大公报》成为引人注目的一张报纸。

《大公报》初创之始,不仅以教育读者、开启民智、提倡学习西方的先进知识为办报宗旨,而且积极反对封建专制,并以“敢言”著称。创刊第二天,该报就发表了《大公报出版弁言》,大胆揭露清王朝的弊政,文中明确表示:“本报但循泰东西报馆公例,知无不言,以大公报之心,发折中之论;献可替否,扬可抑邪,非以挟私挟嫌为事,知我罪我,在所不计。”又直截了当地讲道:“盱衡事实者谓此次变法,虽曰力怯偏私,实事求是;其实仍是循敷衍之故志,毫无精神于其间。……若是者,仅得以谓之变名而已,非变法也。”揭露了慈禧太后等人假变法的真面目。从此,《大公报》本着“知无不言”的原则,“以大公之心”,敢于揭露权贵,敢于为民请命。1902年6月21日《大公报》又发表了长篇论说——《论归政之利》,力劝慈禧归政,并认为归政有八利:“归政则中外利,满汉利,民教利,新旧利,官闾利,草野利,君子利,小人亦无不利。”而对于刚毅、荣禄之流,《大公报》往往指其为“国贼”、“小人”;对袁世凯的告密求荣,英敛之与之斗争了10年之久,致使袁世凯恼羞成怒,多次对《大公报》采取拉拢威逼之手段。

光绪三十一年(1905),爆发了以上海为中心的全国性抵制美货运动,激于义愤,各地报纸纷纷报道

① 柴天宠,字敷林,天津紫竹林天主教堂总管。除进行传教活动外,他还经营建筑材料,创办有“天和号”商铺,因承包各种建筑工程发了财,是《大公报》初创时期最大的股东之一。

② 据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759页注释2,此前有关书刊均认为英敛之生于1866年。方豪《英敛之先生年谱及其思想》考证,英敛之生于同治六年十月二十八日(1867年11月23日)。

③ 报头除法文“公正无私”字样外,在其下边有“天津”的英译文“TIEN TSIN”,左边是公元纪年与馆址,右边是光绪纪年与期号。

④ 左半部分全部刊载“本报代派处”的广告。

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抵制洋货运动,《大公报》亦起而响应。当时的直隶总督袁世凯见到刊登抵制美货的报道,就命令手下通知《大公报》不准刊登这方面的消息。英敛之认为美国禁止华工入境,中国采取抵制美货相应措施是正义行为,便未予理睬。袁世凯大为恼火,但又无法派军警去查封,便于当年八月间一面下令禁止百姓阅读《大公报》,一面禁止铁路运送和邮局投递《大公报》。直隶巡警总局札饬铁道局、邮局照办,并在各处张贴布告:“天津铁路南段、天津府正堂凌、天津县正堂唐,为晓谕事:近来大公报所登类多有碍邦交,妨害和平,合行禁阅,以本月十七日为限,我津埠士商人等一体遵照,伪必究罚不贷。光绪三十一年七月十六日。”

对于袁世凯的高压手段,英敛之多次发表文章予以揭露:“袁世凯之开缺果何为也?曰:怨毒之于人也深,虽阅世而不改;罪恶之所及者大,虽有功而不抵。戊戌政变,袁世凯之获罪景皇帝深矣……设非袁世凯节变于中途,则中国今日当为世界之第一等国矣。今中国之不能与各国比肩,袁世凯迟之也。景皇帝之忧郁终身不得行其志,袁世凯致之也。”“据吾人所见,无前日之袁世凯,今日北洋之权利未必多授外人;无前日之袁世凯,今日北洋之财政未必如此困难;无前日之袁世凯,今日北洋之冗员未必如此之多;无前日之袁世凯,今日北洋之民气未必如此之缓。”《大公报》与袁世凯斗争10年之久,这在当时报界独一无二,并因之名声大振。英敛之以抗官而不做官、不侧身官场与其同流合污而赢得了“敢言”的美誉:“敢言人所不敢言,敢登人所不敢登”。严复曾赠给他一幅对联:“能使荆棘化堂宇,下视官爵如泥沙。”由此也可窥其一斑。报馆设在天津法租界总领事路(又名六号路乙,即今天津哈尔滨道42号)。清朝政府对租界不敢轻易涉足,这也是《大公报》敢言的原因之一。

《大公报》的敢言不仅体现在对清政府及其封建官吏的痛斥上,还体现在大胆地揭露和反对清朝政府残酷迫害新闻工作者的暴行上。对沈荇被杖毙事件的报道,激起了全国人民的义愤。光绪二十九年(1903)初,清政府与俄国签定密约七条,企图控制东北、华北及蒙古等地。沈荇获悉密约后披露报端,大大震动了留日学生,使拒俄运动进一步发展。

由于奸人的出卖,沈荇被捕,并被慈禧下令“杖毙”于刑部。《大公报》对这一惨无人道的事件连续登载,并对清政府动用酷刑的详情予以揭露,激起国内外读者的强烈愤慨。1903年9月4日《大公报》“时事要闻”栏载:“拿刑部之沈荇,于(六月)初八被刑,已志本报。兹闻是日入奏斩立决,因本月系万寿月(光绪生日),向不杀人,奉皇太后懿旨,改为立毙杖下。惟刑部因不行杖,故此特选一大木板,而行杖之法又素不谙习,故打至二百余下,血肉飞裂,犹不至死,后不得已,始用绳紧系其颈,勒之而死。”对于沈荇之死,《大公报》还刊登了中外各方对这一事件的反响,这在当时是非常引人注目的。

2. 替贫苦百姓说话,同情底层人民生活境遇

《大公报》不仅敢言,而且经常替贫苦大众说话,对底层人民的生活境遇寄予深深的同情。它曾发表一些“替穷苦大众说话”的文章,为洋车夫、受虐待的学徒鸣不平,同时对达官贵人侮辱、损害下层人民的罪行也有所揭露。光绪二十九年(1903)1月3日,一篇题为《书颜观察世清请设劝工场稟告》的文章中指出:“国家者大资本家也,政府者资本家之总理也,官吏者大资本家之代表也。”一语道破官商勾结,鱼肉人民的丑恶嘴脸。光绪三十三年(1907)江南一带发生水灾,《大公报》全体同仁发起募捐赈济江南水灾,并将募得的白银及物资全部运往灾区,以后数十年中报社曾多次做过这类社会服务工作。每当遇到灾害,需要募捐救灾的时候,英敛之总是慷慨解囊,赈济灾民,并不断参加赈灾的义演、义卖活动,发表感人至深的演讲,成为专门为老百姓演讲的著名“演说家”。他还拿出自己的书法作品出售,所得收入全部捐赠给灾区,赈济灾民。这一切表现了英敛之及其创办的《大公报》关心人民疾苦的人道主义精神,赢得读者的好感。

3. 推动社会进步,倡导文明新风

英敛之在《大公报》上大力提倡新风俗,革除旧风俗,积极参与和推动天津乃至全国社会风俗的改革。他提倡白话文,撰写、发表白话文,刊行白话专版《敝帚千金》,以白话来探讨各种社会焦点问题,向文化程度不高的读者宣传科学知识,倡导移风易俗。这无疑是一大创举。他大力提倡剪辫易服,以征文和连续报道等形式,向读者宣读“中国之发辫

有百害而无一利”,动员人们放弃“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损伤”等陈旧观念。英敛之还特别关注妇女问题,旗帜鲜明地反对女子缠足,并在该报出版第一天,就特意刊发了一篇《戒缠足说》的白话文。此后,他还参与创办天足会,推动妇女解放自己、解放自己的心灵;还提倡并主持新式婚礼,反对纳妾;支持在天津创办北洋女子公学。另外,英敛之的《大公报》创刊以来,不登黄色和刺激性新闻,当时流行的“花丛谈”、“消闲录”等,均不见于《大公报》。其副刊多用京话和天津土话,文字通俗易懂,这都是《大公报》初创时期的特点。这张报纸的发行量始为3 800份,3个月后增到5 000份,成为一张有影响的资产阶级报纸。

4. 进步的新闻理念

英敛之是中国第一个少数民族报人。他的新闻思想,除了在《大公报·序》中集中阐述之外,后来在他的《论新闻纸之势力》、《原报》、《论阅报之益》等专论中陆续陈述,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第一,报业应坚持开启民智、兴利除弊、大公无私的办报宗旨。英敛之坚持办报,主要是为了打破封建顽固势力的禁锢,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学术文化观点,对读者进行新的思想启蒙。第二,新闻纸具有陶冶国家政治、风俗人情的功能。在他看来,这一功能“非宗教之大力所能及也”,“非帝王之权所能比也。凡势力所能及,威化所必到者,毕莫非新闻纸活动范围之内”^[1]。而这一思想又与《大公报·序》所阐发的一脉相承,对新闻纸的认识进一步升华。第三,办报有益于国家的兴旺发达,读报有益于开发民智。他在《原报》和《论阅报之益》中集中阐发了这一思想。《原报》一文指出,西方报纸林立,人们“视报纸竟如性命,若与水火饮食同为养生具”,“我国也应‘男女大小富贵贫贱莫不识字,莫不阅报’”^[2]。在《论阅报之益》一文中又历数读报的几大好处,把新闻思想与开启民智的舆论宣传紧密联系在一起。英敛之作为清朝政府统治下的臣民,又是一个与皇族结亲的满族报人,能够挣脱狭隘民族主义枷锁,以先进的新闻思想,开创《大公报》百年基业,为中华民族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辛亥革命后,英敛之隐居在北京香山静宜园,专心于宗教、教育、慈善事业,因所居的静宜园在松树

丛中,自号“万松野人”。著有《万松野人言善录》,后又收集在《大公报》上所发表的论文,出版了一本《也是集》。自民国元年(1912)2月23日《大公报》改印“中华民国”年号,英敛之不再管理该报业务。民国十五年(1926)初,英敛之与世长辞,享年59岁。在居住的静宜园山顶的裸岩上留下了他的四个大字:“水流云在”,词句出自杜甫诗“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反映出他淡泊明志的思想境界。

(二) 以丁宝臣为代表的回族报人的办报活动

据光明日报社高级编辑张巨龄研究考证,这一时期回族著名报人有丁宝臣、刘孟扬、张兆麟与张兆龄等。

1. 丁宝臣

丁宝臣(1876~1913),回族,名国珍,字宝臣,经名“萨利赫”,以字行,“即以字运行”之意,清末民初著名社会评论家、爱国报人。丁宝臣出生于北京,祖籍浙江绍兴,幼年曾先后从王友三、马梅斋、马玉麟诸回族开明大阿訇攻读阿文,达到能读、会写、并可对话交流的程度。

光绪二十四年(1898)左右,丁宝臣只身游历山东一带,视野逐渐开阔。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之变”后返回北京,到当时正在密云县清真寺任职的王浩然处深造,光绪二十九年(1903)“蒙众回绅赠万名幛一轴,配幛二十余方”卒業成名。丁宝臣目睹国弱民穷、山河破碎之景,没有担任教职,而是一面在其叔父的“德善医室”行诊,一面秉笔号呼,发表文论。1905年至西单牌楼清真寺,他独立行医,并兼理《天津商报》撰稿人之职;光绪三十二年(1906)4月出版《清真启蒙》一书,提出关于回族应“兴工艺厂”和清真寺应“立半日经汉学堂”的主张,引起保守宗教人士的惊诧,一度掀起轩然大波,被斥为“忤逆”、“反教”。不久,被迫迁回“德善医室”,此后他继续在有关报纸上著文《尽人力就是知天命》、《回回诉委屈》,坚持为振兴民族、富民强国而呐喊。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他的这种主张尚不被一些人理解,有人甚至恐吓、威胁其不准“再在报上演说”。为了真正冲破保守意识的阻挠,宣传正确的道理,开民智、启民风,同年11月丁宝臣愤然弃医,在友人王子贞、杨曼青以及四胞弟丁子瑜的支持

下,创办了迄今我们所见到的第一份回族人办的报纸——《正宗爱国报》,走上了以“开通民智”、“传达民情”、“匡正时弊”、“鼓吹爱国”为天职的新闻事业道路。

《正宗爱国报》是清末民初综合性日报。社址初设在北京东琉璃厂附近的东北园,1907 年 11 月 16 日迁至前门外煤市街小马神庙东口。宣统三年(1911)10 月 22 日,定址在北京琉璃厂西门外(即今西口)南柳巷路东之两层楼房内。该报以唤起人们“合四万万人为一心”,“让黄脸面,黑头发”的中国各族人民“痛痒相关,爱国如命,保卫中华……万万年”为宗旨,并将“尚实”、“提倡公益”、“劝学”、“劝工”等 4 件事,列为办报“六大主意”中的重要内容。其创刊号除了刊有“牛街礼拜寺少阿訇王浩然君……打算到外洋游历,听说于九月十一日(即公历 10 月 28 日)……到了香港,就这两天可以到阿拉伯国”等各类新闻之外,还在“演说”栏中刊出署名“王子贞”的《正宗爱国报的宗旨》一文。第五版刊出的丁宝臣署名的《请看本报的章程》一文,介绍了该报开设的各类栏目,以及“能够振起国民聋聩的说论名言”、“农工商矿各项技艺、东西洋教育家的新理新法”等稿约内容。

《正宗爱国报》是第一张纯“白话文”报纸,该报除转抄“上谕”、“宫门钞”、“总统令”等官样文章外,所有报道、评论、演说均以老百姓口语形式见报,而且多采用幽默、儿化音的老北京方言。该报“守正不阿”、“主持正义”,坚持 7 年之久,达 2 363 期,发行最多至 4 万份,是《京话日报》停刊后,当时影响最大、所办时间最长的报纸。1913 年,该报加强了揭露时弊、抨击袁世凯政权的力度:7 月 26 日,该报刊出关于警察、士兵与议员生活及相应工资对比的“时评”,被袁世凯找到借口,于 7 月 28 日责令停刊,8 月 1 日以“惑乱军心,收受乱党资助”为借口,将“总理”丁宝臣逮捕,于 8 月 19 日晨将其杀害,该报亦就此停刊。

丁宝臣不仅担任“总理”、策划、出版、发行,兼做编采工作,还撰写了大量社会评论及新闻作品。其发表的《请看本报的章程》、《大呼我国同胞》、《将来之阿衡》、《信》、《我不由得大喊三声》、《大呼教养局习艺同胞》、《医生劝医生》、《十年之后方知

我》、《北京社会之糟糕》、《说合群》、《立宪之大纪念》、《死而后已》、《传真方卖假药》、《眼光必须放大》、《救危险之要策》、《请废鸦片旧约》、《再说说请废鸦片旧约》、《与客谈》、《钱商倒闭宜照章办理》等,不仅脍炙人口,而且为我们研究作者的思想、清末民初时代的回族,乃至中国社会的历史,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材料。

民国七年(1918)4 月,也就是丁宝臣遇害 5 年后,有人在当时的报纸上刊文评论说:“丙午秋,京话日报即停刊,即有数种白话报相继发现,如京话时报、公益报、进化报、正宗爱国报、国民报、京都日报、北京新报等等。其中宗旨正大的,当以进化、公益、国民与正宗爱国报为最,至于能够维持久远,有功与社会者,可就以《正宗爱国报》为专了……该报处于专制政府之下,仍能保全,且能主持正论,以尽报纸之天职……自当首屈一指,其中一种旁攻侧击讥讽,不伤雅道之论调,确属不可多得,那是鄙人最爱最崇拜的。”丁宝臣是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位被北洋政府杀害的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报人。

2. 刘孟扬

刘孟扬(1877 ~ 1943)是周恩来、邓颖超的同学,也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活动家、第一张少数民族妇女日报《妇女日报》的创办者、五四爱国学生刘清扬之兄。其原名“梦扬”,是中国文字改革事业的主要先驱者之一。宣统元年(1909)有关报纸介绍如下:“刘孟扬,原名梦扬,字伯年,天津县回教人,现年三十二岁。二十二岁以冠军入学,曾应大公报馆之邀主持笔政,光绪三十一年因抵制美约过力,大公报被禁,适天津商会创办商报,乃约充该报经理。又经过天津南段巡警总局约充书记官兼充课长,自是沉浮于宦海中者三年之久。然生性憨直,淡于仕进,现又脱离官界,自行组织《民兴报》矣。光绪二十八年天津创设公益天足社,一时不缠足之风大开。本年在天津创设风俗改良会,赞成者甚众。”

刘孟扬曾著有《庚子拳匪变乱记》,但未及刊印,原稿现已遗失;《警察职守事宜问答》,经天津南段巡警局刊行;《中国音标字书》,以罗马字拼写《中国音标学万字》,1957 年由文字改革出版社再版;还有《京音识字简编》,未知所在,需要进一步挖掘。《民兴报》于宣统元年(1909)3 月 7 日出版,当时所

刊广告云:“本报以正民德、开民智、达民隐、作民气为宗旨。议论公正,词义浅显,新闻精确,小说新奇。”

民国元年(1912)4月,刘孟扬在天津创办《晨报》,社址在南市广兴大街13号,后迁往河东金汤大马路。他同时还创办《白话晚报》,10月又创办《白话晨报》,民国五年(1916)再创办《白话午报》,后改称《天津晚报》、《天津晨报》、《天津午报》,总名“午报社”。3张报纸一套人马,内容大同小异,根据新闻稿的性质及收稿时间分载于三报。印刷时间相差不大,有时三报合并出售。刘孟扬为社长,白幼卿为经理,董秋圃为总编辑。由于社长忙于其他事务,编辑工作实际由他的侄子刘钟望负责。

3. 张兆麟与张兆龄

张兆麟(1865~1939),字子歧,回族,祖籍河北通县(现为北京市通州区)。据说他系晚清宫廷武官之后,幼年家道中落,光绪三十二年(1906)赴东北,因感于国情创办《醒时汇报》,光绪三十四年(1908)赴沈阳筹办《醒时报》,12月获官署准予发行。他自任社长,宣称其办报宗旨是“代表舆论,为民众作喉舌”,聘营口塾师孙普笙为主笔,其弟张兆龄(1869~1909),字子山,为副主笔。张兆麟是拥护维新变法的爱国者,热心开通民智,尤重国家主权。宣统二年(1910)10月左右奉天省咨议局催开国会成立,他被举为回民代表,去北京递请愿书。这一年的一天,他在营口目睹英国轮船“子午号”欺辱中国乘客,愤笔揭露其丑行,隔天见报后,英方向奉天省总督府提出交涉。营口警察厅传讯张兆麟时,他以“亲临目睹”且有书证在手,迫使英人理屈词穷。后来,他在回忆此事时,这样叙述了当时的思想活动:“子歧一想,本报主张公论,正大无私,何不再再接再厉,坚持到底,在报上提倡招商集股,募收股款我国自造轮船,航行海面,实行客运、货运,抵制子午轮船,撤销他的营业?”于是该报续做报道,并呼吁国人自办海运,在社会上产生强烈影响。

《醒时报》、《正宗爱国报》、《竹园白话报》、《民兴报》被称为当时的“四大回族报纸”,但这种说法也有不妥之处:因为这4张报纸是面向社会的综合性报纸,只不过因为办报人是回族,关于回族的报道和刊出的数量相对多些就是了。所以我们将以丁宝

臣为代表的5位报人称为“回族五大报人。”

(三) 满族宗室和八旗子弟的办报活动

1. 《大同报》

光绪三十一年七月二十日(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这一时期,留日学生已达13000人左右^[3]。两三年间,留日学生的革命报纸就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有三四十种^[3]。《大同报》即是其中为数不多由少数民族创办的颇有影响的报纸之一。《大同报》于光绪三十三年五月(1907年6月)创刊,月刊,社址在东京早稻田鹤巷町493号,创办者是当时在日本东京留学的满族宗室恒钧等人。刊物的主要撰稿人有恒钧、乌泽声、穆都哩、佩华、隆福和荣升等。此报由东京大同报社编印,在北京发行,国内许多书店都有其经销处。创刊后,该刊在东京各报刊出广告,宣传其办报宗旨,并指出:“第一号首论中国之前途,凡外患内治人民政党皆导以一定之方针,次论满汉问题,凡立宪问题、种族问题,皆予以正当之解决。出现以来,尤为海内外同志欢迎。”^①《大同报》创办后,在资产阶级立宪派中产生了极大影响,恒钧等人随即在北京创办了《大同日报》,与之遥相呼应^[4]。

《大同报》是晚清资产阶级立宪派宣传其政治主张的重要刊物。该刊以“倡导立宪,融合满汉为唯一宗旨”,创刊号有杨度的题词和题为《大同报序》的代发刊词(署名为乌泽声)。《大同报序》阐明了该报的办报宗旨:一为主张建立君主立宪政体;二为主张开国会以建设责任政府;三为主张满汉人民平等;四为主张统合满汉蒙回藏为一大国民^②。在满汉关系问题上,《大同报》倡导的满汉融合主张既受到晚清时局发展变化的深刻影响,也与创办者接受过新式教育的满族知识分子所持有的政治立场密不可分。

清朝晚期,在西方列强侵略和争夺下,中国濒临亡国灭种的严峻形势,这是促使《大同报》报人力挽危局,深刻认识满、汉关系的重要社会原因。事实上,从19世纪80年代英、法侵略云南开始,西方列强就开始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甲午战争后,只

① 载《中国新报》1907年7月20日

② 乌泽声《大同报序》,载《大同报》第一号。

过了短短几年,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中国沿海重要港湾都树起了帝国主义列强的旗帜;许多重要的铁路干线的修筑权,为它们所攫取;中国的几乎全部国土被划分为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势力范围。中国面临着从半独立国——半殖民地沦为殖民地的严重危机。”^[5]世乱则文辞盛,正是在清朝统治行将瓦解的形势下,开明的满族知识分子遂以报纸为武器,积极鼓吹君主立宪制度。他们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各民族的利益休戚相关。《大同报》的创办者之一乌泽声明确指出:“国兴则同受其福,国亡则俱蒙其祸,利害相共,祸福相倚,断无利于此而害于彼之理。”^①他力主民族平等、融合,尤其重视满、汉两族的融合:“满汉风俗相浸染、文化相熏浴、言语相揉合、人种相混合程度较各族为高,关系较各族为切,则负救国之责任,尽国之义务,亦不得不较各族为重。”^③《大同报》所持立场得到了清政府的认同。该报创刊后,北京民政部立即予以表扬,赞其“春怀时事,不忘在莒”,内容“诚堪嘉尚”,并要求京外各督抚将军“飭属购阅,以利销行”^[6]。

《大同报》所倡导的满汉融合思想是创办者所持有的社会改良立场在其民族观中的具体反映,其思想主要来源于早期立宪派的民族平等融合主张。立宪派著名代表人物杨度对《大同报》的影响最大。杨度(1874~1931),字哲子,湖南湘潭人,曾留学日本。1907年,杨度创办《中国新报》,积极倡导君主立宪。在民族问题上,杨度提出了许多富有价值的见解,其民族思想的核心是“五族共和”。他非常重视各民族的联合与融合:“中国之在今日世界,汉、满、蒙、回、藏之土地,不可失其一部,汉、满、蒙、回、藏之人民,不可失其一种……人民既不可变,则国民之汉、满、蒙、回、藏五族,但可合五为一,而不可分一为五。”惟有如此,才能实现“不仅国中久已无满、汉对待之名,亦已无蒙、回、藏之名词,但见数千年混合万种之中华民族,至彼时而更加伟大,益加发达”的目标。同时,他还指出:“一民族与一民族之别,别于文化。中华云者,以华夷别文化之高下也。”^[7]民族融合的关键是彼此间文化的接近。杨度的上述主张在留日学生,特别是满族宗室留日学生中影响很大。以恒钧、乌泽声为代表的《大同报》报人所宣传的满汉融合思想就是对杨度主张的“满、汉平等,

蒙、回同化”的“国民统一之策”的继承与发展。

《大同报》的创办者是经过西学熏陶的满族知识分子,他们深恶痛绝西方列强的侵略,他们强烈抵制以“排满”为重要特征的革命浪潮,他们渴望民族振兴而又不愿失去自身的特权与利益。在晚清革命派主张“排满”、保皇派主张“排汉”这两种极端的思想宣传与动员之外,他们强调满汉融合。概言之,《大同报》的满汉融合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密切关联的3个方面。

第一,《大同报》指出满汉之间并没有界限,满汉是同一民族,所谓“满汉至今日则成同民族异种族之国民矣!”^②乌泽声根据日本学者高田早苗的民族要素观,从言语、政治、职业、生活、教育、风俗、宗教、人种等诸多方面对满汉融合为一族的观点进行了阐释。如在语言方面,“初固有所谓满语汉语之别,相习已久莫不讲同一之语言。今且满人居于粤者粤语,居于楚者楚语,居于鲁者鲁语,居于晋者晋语,居于何处即能操何处之土语”;从人种来看,“吾中国满汉通婚于法律上虽开禁未久,于事实上则已数百年。……人种混同早遍中国,而血胤为组织民族之重要元素,满汉早已合同化,合此公例,是以满汉至今日已成一民族而不可分为两民族。”^①不仅满汉如此,穆都哩甚至认为“中国之人民,皆同民族异种族之国民”,他还在《蒙回藏与国会问题》一文中进一步说明了中国之所以是一个民族的原因:“盖民族之成,国民之合,其绝大之原因,全由于外部之压迫及利害之均等,而他种之原因,则一缘于居于同一之土地,一缘于相安于一政治之下。至于言语、风俗习惯,虽为成立民族及国民之要素,然有时不以此而亦能判定其为某国之国民。”^③从穆都哩的分析中不难看出,《大同报》报人在寻求民族振兴的过程中,其所倡导的民族融合的“大民族”观无疑是对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的否定与超越。正是基于这种“大民族”观念,《大同报》对排满、排汉都进行了激烈的抨击,排满者力主共和,而于“中国之前途,人民之幸福,彼未尝一措意也”,排汉者“只顾一族之私利,不问国家休戚,真国民之蠹贼也”^④。

① 乌泽声《论开国会之利》,载《大同报》第四号。

② 乌泽声《满汉问题》,载《大同报》第一号。

③ 穆都哩《蒙回藏与国会问题》,载《大同报》第五号

④ 乌泽声《满汉问题》,载《大同报》第一号。

第二,《大同报》在对西方殖民主义进行批判的基础上,把满汉融合提高到关乎国家兴衰存亡的高度。乌泽声指出,列强“挟其殖民政策、侵略主义,以临东亚之大陆。饮马于长江,逐鹿于中原,割我土地,奴我人民,据我军港,损我利权。彼惟有要求,我惟有承诺;彼惟有进取,我惟有退让”。在西方列强肆意侵略的野蛮世界:“非合全国之人齐心一致以图之不可。”^①恒钧亦持有同样的见解:“对外只有同心努力以禦外患,对内只有研究政治以谋改良,满之不如汉者削之,汉之不如满者改之。庶几享同等之权利,服同等之义务,内力充足,百废俱举,外患或可不来,中国或可久保。”^②如果满汉两族各持民族主义以求胜于本国,最终必然导致“种族之相残,国民之崩析,将现于中国”^③的悲惨局面。

第三,《大同报》提出了解决满汉问题的方案及具体措施。乌泽声等人主张满汉融合,他也承认满汉之间尚存在诸多问题,并认为满汉问题的产生及其解决都有赖于政治。他直言:“满汉不融合即以政治不良为之原因,欲求满汉之融合亦当以政治改良为之结果。然不有开国会之原因,又未有收政治改良之结果者,故吾人之所主张即以开国会为融合满汉惟一之利器也。”同时,乌泽声提出了以君宪融满汉的具体实施方案:废除八旗制度,满汉问题就能迎刃而解,即“裁撤八旗,示满汉以军事上之平等,停止旗饷示满汉以经济上之平等,釐定法律示满汉以法律上之平等,改官制示满汉以政治上之平等,则吾人主张满汉平等之目的达矣。”

光绪三十四年(1908)3月,《大同报》出至第七期停刊,创办者回国在北京出版《大同日报》,继续宣传满汉人民平等、统合满、汉、蒙、回、藏为一大国民的思想。毫无疑问,《大同报》作为一份政治性报刊,它希图通过君主立宪来挽救内忧外患的危局,事实证明这种政治追求只是一种美好的幻想。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大同报》主张融合满汉,混一蒙、回、苗、藏诸族的大民族观念包含了很多合理的要素,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第一,寻归“大同”表明,在开明的满族知识分子心中已然形成了民族平等融合的意识,并且这种观念通过《大同报》等报刊得以广泛传播。基于政治立场的一致性,《大同报》与杨度的《中国新报》、

李庆芳的《牖报》等立宪派人士主办的新报刊互相支持,大力宣传满汉融合。《大同报》第三号曾登载64个“本社名誉赞成员姓名”,其中满、蒙旗人约占80%,另有杨度、汪康年、土尔扈特郡王等汉、回、土尔扈特等各族成员,这份名单表明其“融合满汉”的主张,已赢得了一定范围的支持者,尤其得到了满族各阶层人士的广泛支持。另外,《大同报》的发行量亦可表明这份报刊在当日之影响,其第三号出版广告中说:“自出版以来,大受海内外同志诸君所欢迎,第一二期俱已印刷再版,而第一期销售罄尽,爰再精印三版。”

第二,满汉融合主张的提出体现了晚清满族知识分子对中国前途与命运的深切关注,他们通过《大同报》传播的这一思想反映其积极参与社会变革的主动精神。由于《大同报》创办者与主笔的满人身份,他们的主张更容易为同族人所接受,也更容易引起居于统治地位的当权者的重视。虽然现无材料直接说明清政府对《大同报》倡导的满汉融合主张持何种态度,但是仅据《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一书所收,从光绪三十三年(1907)7月两江总督、曾出国考察宪政的满人端方代奏李鸿才“条陈化满汉畛域办法八条折”,提出“满汉之界宜归大同”这一主张开始,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4月,上达朝廷关于“平满汉畛域”的专题奏折达20条之多,上折者包括满族、蒙古族、汉族等不同民族近20位成员。从清廷特谕“内外各衙门妥议化除满汉畛域切实办法”及各部踊跃上折这一事实可知,满洲统治者在日益高涨的“满汉融合”的呼声中,他们对民族平等的要求已有所了解,并且将消除满汉畛域作为政治改革和民族国家建设的重要内容。从《大同报》所阐发的民族主张与清政府调整满汉关系的诸种举措可以看出,《大同报》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晚清社会的走势。

第三,只有彻底废除封建统治,在创造必要的政治与文化条件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实现国内各民族的平等、融合与发展。显而易见,《大同报》满汉融合的“大民族”主张尚缺乏相应的社会实践环境。需要注意的是,《大同报》的民族融合主张是针对革

① 恒钧《中国之前途》,载《大同报》第一号。

② 乌泽声《论开国会之利》,载《大同报》第四号。

命派激烈“排满”作出的回应,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革命派的‘排满’观念在与立宪派的论争中不断得到修正,并非到了辛亥革命爆发后,革命派才一下子来个彻底的自我否定,完全接受立宪派的主张。”^[8]

也就是说,革命派在与《大同报》等立宪派的论争中,他们逐渐认可并接受了满汉融合的主张。因此,辛亥革命后革命党人迅速放弃了“排满”理念,而将“五族共和”的民族平等融合原则立即付诸实践。民族平等、融合理念是中华民族弥久历新的宝贵精神财富,而《大同报》的满汉融合思想则是具有现代意义的民族平等观念。从这一层面来看,《大同报》倡导的满汉融合思想就不应该随着立宪运动的破产而被淹没,它值得引起人们更多的关注^[9]。

2.《中央大同新闻》

《中央大同新闻》是在北京的八旗子弟创办的报纸,宣统元年(1909)出版,社长为恒诗峰,日报,每份为对开一大张,“以变通旗制,促进宪政为宗旨”,致力于君主立宪的宣传。

以上报刊反映了一部分满族开明人士对立宪的态度。其创办人是受过资产阶级教育的满族中上层知识分子,在帝国主义入侵、国内革命情绪高涨的形势下,他们认识到清朝的封建制度已到了崩溃的边缘,想督促清政府采取一些改良措施,倡导建立君主立宪政体,因而他们的宣传得到维新人士的支持。政闻社曾经考虑为《大同报》输送主笔,给予人力上的支援^[10]。

(四)白族学者赵式铭的办报活动

1.白族诗人、语言学家、历史学家赵式铭

赵式铭(1872或1870~1942),云南剑川县人,白族,字星海,号戮父,晚号僮翁。出身于贫苦的教师家庭,自幼同情劳动人民。7岁随父读书,已能背诵古诗文,后从白族学者继续深造。15岁以第一名通过童子试。光绪二十二年(1896)应乡试,因在试卷上“放言时务”,抒发爱国思想,勉以副贡^①。后到剑川、丽江县任教。曾创办《丽江白话报》、《永昌白话报》。并于宣统元年(1909)与钱民阶、由云龙在昆明创办《云南日报》,并任该报编辑。此间,曾以时事为题材,撰写了滇剧本《苦越南》(后加工改编,在丽江公演),以元曲形式撰写宣传宗教改革的《莲花生传奇》,以五言诗形式创作组诗《鸿雁来,思合

群也》、《促织鸣,劝尚武也》、《职蜂怨,讲公德也》、《雕鹗恨,奖任侠也》。此外,还为丽江中学撰写校歌,他的短篇小说《并头莲》激发爱国热情,提倡婚姻自由。宣统元年(1909)被送北京参加全国举贡会试,录取后到四川任灌县都江堰治河小官。其间,他不仅撰写了歌颂祖国大好河山的诗歌,还撰写了一篇名为《考察四川灌县都江堰工利病书》的近代史实录。辛亥革命担任蔡锷都督的记室,兼纂光复志,并加入南社、苏州国学会。民国十五年(1926)再度在云南教书,民国十九年(1930)任云南通志馆副馆长,在此前后曾与周钟岳等编纂(民国)《新纂云南通志》,任副总纂、总纂。他反对蒋介石镇压人民、围剿红军,对日本侵略者采取不抵抗政策。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虽养病在家,还以自己的诗文热情鼓励云南健儿奔赴前线,英勇杀敌。民国二十八年(1939)任云南通志馆馆长。抗战期间时局艰难,他过着“年荒钞诗常争米,新贵书信亦拾藤”的生活。民国三十年(1941),他以年迈多疾之躯,完成了省志编纂工作后,从省城昆明回到了家乡。民国三十一年(1942)病逝于故里。著述有《白文考》、《爨文考》、《么些文考》、《云南光复纪要:光复起源篇、建设篇、西征篇》,还有《睫巢诗稿》、《希夷微室诗钞》、《睫巢文稿》、《行年七十自述》等诗文。

2.《丽江白话报》

光绪三十三年(1907)创办的《丽江白话报》,是云南历史上最早的白话报,也是云南最早的具有近代意义的报纸,因为《丽江白话报》创办之前,全省只有一份光绪二十九年(1903)由云南督抚衙门办的带有邸报性质的《滇南钞报》。但“这是一张带有邸报性质”的报纸(《云南省志·报业志》),还不能说是一份具有近代意义的报纸。《云南日报》创办于宣统元年(1909)10月5日,比《丽江白话报》还晚两年。

《丽江白话报》是光绪三十三年(1907)在丽江府知府彭继志主持下创办的。为创办《丽江白话报》,首先成立了由纳西族学者和积贤任社长的丽江府白话报社,并聘请剑川名士赵式铭担任主笔(主要撰稿人),组织了周冠南、周谟、赵荃、习彦卿、

^① 科举制度中贡入国子监的生员之一。清制,在乡试录取名额以外列入备取的,可直接入国子监读书,称为副贡。

习祚卿、王竹淇、李杏梅、杨葆光、杨葆元等一批当地学者为撰稿人。同时,为了出版《丽江白话报》,还特地从内地请来了工匠刻铸铅字,成立了丽江活字板制造所(后改为丽江印书馆)。铅印的《丽江白话报》为月报,每月中旬发行,每期10至20页版,用的是24厘米×14.5厘米的白绵纸。初期只在丽江、鹤庆、剑川、维西、中甸等地学校发行,后来在云南提学使叶伯皋的倡议下,《丽江白话报》发行范围一度由滇西北发展到全省各地。但次年彭继志调离丽江后,人去政息,《丽江白话报》遂停办。《丽江白话报》的办报宗旨是以“物竞天择”、“优胜劣汰”进化论思想为武器,宣传变法维新、抵御外侮、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等主张。

《丽江白话报》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号召民众愤发猛省、团结爱国、反抗外来侵略。道光二十年(1840)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使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光绪年间维新变法运动又遭失败,国家、民族面临生死存亡关头。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创办的《丽江白话报》,突出反映了丽江人民团结爱国、要求富国强兵的思潮,特别是唤起民众、反抗外敌入侵的思想。《丽江白话报》第一期发刊词中是这样说的:“莽乾坤是一大舞台,是强的生杀予夺随安排,是劣的奴隶牛马也应该。看,茫茫大陆,莫只有强种常在。叹,此意有几人得解?愿身化恒河沙,苦把同胞戒;问晨钟暮鼓,可醒过南柯来!”“只有认清形势,愤发猛省,发展教育,造就爱国国民,才能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只有今日之下,地方被人占了,权利被人夺了,人民被人欺侮了,再要听天,再要安命,那洋人就要搬进房里了!”“如今东西洋各国,他的文明程度愈高,他的灭国手段更熟。……波兰、埃及、土耳其、缅甸、越南、琉球各国,他那亡国的惨状,更是不堪寓目。现下单剩下亚洲老大帝国,四四方方整整齐齐的一块肉,也是今日尝一脔,明日割一片;他的周围,已割去殆尽,连那块肉的内部也有染指的,也有垂涎的;中国若再荏苒荏苒蹉跎蹉跎,恐怕不久也就与那红人黑人为兄弟了……”“昔人有诗云:‘子规夜半尤泣血,不信东风换不回’……如今中国的现象,也与那绿暗红稀的残春一般,但得几个痴心热肠的,呼号奔走,何尝不可

转危为安呢!”从北京现存的部分《丽江白话报》各期发表的文章看,期期都有宣传唤醒民众、反对外敌入侵的文章。第二、三、四期连续发表了反映中法战争、谴责法帝吞并越南、支持越南人民抗侵略斗争为题材的剧本《苦越南》。此剧发表后,曾在丽江及昆明公演,每次公演时演员流泪,观众痛哭,激发了民众巨大的爱国热情。《丽江白话报》第五期又发表了声讨英法染指云南、沙俄蚕食黑龙江大片国土的文章。

第二,宣传教育救国、实业救国,提倡发展科学教育文化和工商业。《丽江白话报》在大力呼吁同胞要认清“中国危亡的祸害就在眼前”严峻形势的同时,非常重视宣传教育救国。其中一篇文章中写道:“我们的五官百骸,同那洋人的五官百骸,俱是一样的构造完备,何以他们如此的强,我们如此的弱?这个原因,全在有教育无教育的区别;今日开办学堂,是要造就多数国民……国中受过教育的多数国民,鼓起爱国力与团结力来,就能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与此同时,从救亡的角度出发,《丽江白话报》也刊登了一些要求发展民族工商业的文章,指出要变法图强,就要学习西方注重发展工商业的经验,走实业救国之路。第六期发表的《劝注重工商业》一文同时反思中国落后挨打的原因:“这工商两业,为我社会生活命脉,是断断不能缓的。如今是工商世界,外人的工商学已发达到极点:为工的日新月异,层出不穷,为商的集大公司股本巨万。他那红红绿绿的国旗所到,国力随之,吸我脂膏,敲我骨髓,目之所触,耳之所闻,无一不是洋货;中国虽地大物博,为此剥削,其何以堪?”《丽江白话报》在宣传实业救国思想的同时,还发表了一些旨在促进丽江资源开发、地方工商业发展的文章,如刊登于第七期的《矿物学课外余谈》(作者周冠南)、第八期的《矿务浅说》(作者赵荃)。

第三,针砭时弊,反对吸食鸦片和愚昧迷信。早在鸦片战争前夕著名的《林则徐禁烟奏折》之前,丽江学者马子云在嘉庆十年(1805)前后的一次后岁试考卷中写下了《去官邪,锄鸩毒论》的惊世文章,最早提出禁烟的主张。《丽江白话报》继承了前辈的遗志,不断为禁绝烟毒大声疾呼,发表了不少针砭吸食鸦片等社会恶习的文章。第四期中《论鸦片烟

之害》写道:“曩年美国举行圣路易博览会,美人取中国烟枪一节,小脚鞋一双,八股文一本,摆入陈列品中,大为全球所讪笑。所以外人对中国人民,字之曰老大帝国,兮之曰东方病夫,口角尖酸,至于此极!其实皆是我们的真正现象,何尝有一点污蔑?所以奉劝青年同胞,有瘾的急宜猛攻,无瘾的勿蹈覆辙,大家做个伟大的国民,就不至贻外人口实,玷中国名誉了!”对当时社会上的愚昧迷信等落后习俗,《丽江白话报》也进行了毫不容情的揭露和针砭,呼吁国人要认清迷信和愚昧是中国富国强兵之大害。比如第五期的《论迷信风水之害》一文说:“大凡人生世上,王侯将相,是在人自造的。若听堪舆先生的谎话,今日请他寻来脉,明日请他下罗盘,把哀痛迫切的日子,匆匆的尾着师马屁股后跑来跑去,真是呆得可笑,愚得可怜……昔孔子少孤,不知父墓……未曾听见过孔代祖塋,是什么‘万笏朝天’,什么‘一品当朝’……未曾听过培根的坟地,什么是‘青龙画岸’,卢梭的坟地,是什么‘丹凤衔书’,孟得斯鸠的坟地,是什么‘涣翁撒网’,洛其福儿的坟地,是什么‘弥勒晒肚’……他们越不讲堪舆,越国富兵强,我们越讲堪舆,越民穷财尽;孰得孰失,明眼人不难了然。”

第四,提倡敢为天下先、勇于开拓、犯难冒险的精神。《丽江白话报》对当时社会上某些人的保守愚昧、因循懒惰、不思进取的精神状态进行了有力的批评,不断发表文章向同胞大声疾呼要敢闯敢冒。在第七期的《说冒险》中,作者赵星海大声疾呼:“奉劝诸君:远的要学我先民张骞、班超,近的要学我云南人郑和,大伙儿鼓起精神,做出惊天动地的大事业来,这才不愧为黄帝子孙呢!”除了针砭时弊,唤醒民众的宣传报道之外,《丽江白话报》还刊登了不少文艺作品,开辟了类似副刊的专栏和栏目,旨在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唤起民众爱国之热力”。《丽江白话报》作为少数民族在民族地区创办的最早的白话报刊之一,我们为其办报思想、风格及办报内容的超前深感敬佩。当年该报发表的文章,至今仍闪耀着先进思想理论的火花,具有很强现实意义。

此间,除《丽江白话报》之外,在云南丽江地区还印刷过一些科普性质的报,如宣统三年(1911)的《种棉法略》、民国元年的《养牛白话》。

从上述重点介绍的满族、回族、白族等少数民族

的办报活动中,我们可以发现其中真正的报人并不多,只有英敛之、丁宝臣等人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他们热爱的办报事业。报纸是政治集团的耳目喉舌,即使文人学者办报,比如满族宗室留日学生主办的《大同报》和八旗子弟的《中央大同新闻》,都有明确的政治倾向的。他们所提出的“满汉人民平等和满汉蒙回藏各民族的团结”、“融合满汉为唯一宗旨”是以宣传“君主立宪”为目的的,客观上说明了少数民族的办报活动一开始就意识到民族问题、民族团结的重要性。

二、民国孕育时期的 主要少数民族报刊

由于少数民族报人的积极活动,在民国孕育时期的中国就出现了一批较有影响的少数民族报刊。正是它们的出现和存在以及不断发展,才使得当时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业呈现出一个新的气象,也为民国创立以后的少数民族新闻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一) 民国孕育时期的回族报刊

回族报刊是特指专门针对回族及其宗教文化进行报道与研究的中国回族穆斯林报刊。这类报刊内容多以阐发伊斯兰教义,宣传回族历史、文化及宗教信仰,倡导民族教育及文化交流,宣传爱国爱教思想,团结各地回族民众,传递各地回族消息为主。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斗争逐渐高涨,寻求民族复兴、国家独立,成为中华民族共同面临的历史任务。这种民族忧患意识和民族责任感,同样唤醒了回族民众的爱国热忱。

1. 《竹园白话报》

戊戌变法时期,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出现了第一个办报高潮,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办报活动冲破了封建统治者的言禁,报刊成为思想启蒙和救亡图存的武器。光绪二十四年(1898)戊戌变法失败后,资产阶级民族革命的舆论与日俱增,并在辛亥革命时期掀起了第二次办报高潮。在第一次办报高潮的影响下,第二次办报高潮出现初期,大批回族爱国团体相继成立,各种回族进步刊物也相继出版发行。其中《竹园白话报》是创办最早的回族白话文报,光绪三十三年(1907)由回族报人丁子良创办于天津,以

“注重启迪回民”为宗旨,用敏锐的观察和锋利的笔锋剖析时政,宣扬民主革命思想^[11]。

丁子良(1872~1932),名国瑞,字子良,别号竹园。清末及民国时期著名社会活动家、评论家、爱国报人、医生。光绪二十一年(1895),他携眷定居天津,一面行医,一面关心时事政治,参与社会活动,并挥毫著文,抨击时弊,畅言个人理想。从光绪二十三年(1897)起,他先后撰文于《直报》、《大公报》、《中外实报》、《社会教育星期报》、《正宗爱国报》以及《民兴报》。光绪三十三年(1907),他创办《竹园白话报》,抑恶扬善,为民请命,充满爱国爱民情感的时评、论说、寓言故事等作品,深受广大读者喜爱。1907年,《正宗爱国报》开辟《竹园白话》专栏,亦庄亦谐,曾被“呈御览”受到光绪帝称赞。据回族学者张巨龄不完全统计,丁子良在天津35年间,仅1924年开始成集的24本《竹园丛话》中,就收入其作品626篇,达百万余言。其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艺术、教育、卫生、历史、民族、宗教、天文、地理、水利、交通、体育、伦理道德、社会风俗等,几乎涉及工农兵学商等各个行业,为人们研究清末及民国时期中国的历史和近代回族史留下了重要资料。

2.《醒回篇》

光绪三十四年(1908)由留学日本的回族学生以“留东清真教育会”名义在日本创办。埃及的一位军官为其题写阿文刊名:“伊斯提噶祖乐伊斯俩目。”(唤醒伊斯兰)这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回族报刊。“留东清真教育会”创立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6月,是在清政府驻日公使杨星垣的支持下,由集会于东京的来自全国14个省的36名回族留日学生创立。其宗旨为“联络同教情谊,提倡教育普及,宗教改良”^[12]。徐廷梁为编辑长。值得一提的是,《醒回篇》中赵钟奇的《论中国回教之国民教育》一文,明确提出了民族团结、同舟共济的主张,他说:“中国今日之形势,四面皆敌,费协力同心,化除种族之界,化除宗教之界,化除疆域之界,合四百兆之脑髓而为一大知识,合四百兆之资产而为一大经济,合四百兆人之体力而为一大陆军,否则分崩离析,带来瓜剖豆分之患。”光绪三十一年(1905)同盟会成立,提出了“革命排满,建立共和”的口号,这在当时

有一定的反对帝国主义和满族封建统治者的积极意义,但是也暗合大汉族主义思想。在一片“排满”、“仇满”和“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声中,这种以少数民族身份提倡民族团结、共赴国难、同雪国耻、真心国家的主张,显得难能可贵,表现出回族先进分子的诊治觉悟和宽广胸怀,以及他们不拘泥于民族与宗教偏见的思想境界,这种思想影响了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对其逐渐形成的“五族共和”思想起了一定的作用^[13]。《醒回篇》可称为近代回族历史上第一份具有进步思想的刊物,虽只出了一期,但对国内回族的影响很大,不仅唤醒了回族同胞,传播了新思想,而且在回族报刊史上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成为日后回族先进知识分子和开明宗教领袖创立回族社团和报刊的一种可借鉴模式。

(二)民国孕育时期蒙古文字报刊

中国最早的蒙古文报刊是《婴报》。《婴报》是内蒙古地区的第一份蒙古文报刊,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少数民族文字报刊。该报创办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冬,4开,隔日出版,石印。社址设在内蒙古昭乌达盟喀喇沁右旗王府崇正学堂院内。该报以启发民智、宣扬新政为宗旨,主要刊载国内外重要新闻、科学知识、内蒙古各盟旗政治形势的动态以及针对时局的短评,免费投递。崇正学堂内师生为其供稿。《婴报》出版六七年之久,辛亥革命时期终刊,对宣扬新政、启发民智,对内蒙古地区的社会发展、民族进步起到了重要作用。报馆内还设有一个略具规模的小型图书馆,藏有《古今图书集成》《佩文韵府》等书籍,供校内外师生和旗衙门内的行政人员阅览。当年在学堂任教的邢志祥(教务长)说:“贡王办教育办报纸,不但蒙藏尚在梦中,就连热河全省也未闻一处。”

该报的创办人贡桑诺尔布(1871~1930或1873~1931)生于内蒙古卓索图盟喀喇沁右翼旗(今赤峰市喀喇沁旗)蒙古贵族家庭,字乐亭,号夔鑫。其父旺都特那木济勒为喀喇沁右翼旗扎萨克亲王兼卓索图盟盟长。他的家庭为成吉思汗勋臣乌梁罕济拉玛的后裔,贡桑诺尔布后来被封为头等塔布囊^①、辅国

① 塔布囊,亦作“他卜浪”、“倘不能”、“他不能”、“他卜能”、“拓不能”、“倘不浪”等,蒙古语音译,意为驸马;明代蒙古人对于同成吉思汗后裔女子结婚者的称号,其地位相当于台吉。绝大多数出自太师、宰桑等非成吉思汗后人的贵族及其子弟;至清代,成为封爵之一,为“驸马”“郡马”“额驸”的通称,仅用以与清室通婚的喀喇沁部三旗贵族。

公、喀喇沁郡王。

贡桑诺尔布 6 岁时师从丁举人和在喀喇沁中旗蒙古文学者伊成贤,学习蒙满两种文字。十四五岁熟读四书五经和古典诗文,能写八股文,会作试帖诗,并攻读藏文经卷,练习拳击和骑射。16 岁与清肃亲王之三女善坤结婚。婚后仍勤于在外书房练习写字和绘画,并研究音韵和诗赋格律,同时整理其父《如许斋诗集》。贡桑诺尔布精通蒙、满、藏、汉等多种文字,并学过日语,喜吟诵,好属文,工书法,擅绘画,精于蒙古传统骑射,文武双全。身为蒙古贵族的特殊身份,他得以有较多的机会进京觐见和值班当差,并结识梁启超、吴昌硕、严复等民主人士。他在北京太平街喀喇沁王府多次会见孙中山先生。在这些人的影响下,他的思想逐步向民主、民本化倾斜,开始信奉三民主义,向往平等、民主、自由政治制度,并毅然加入了中国同盟会。光绪二十四年(1898),其父病死,翌年晋京,承袭喀喇沁王的爵位,他首先革除弊政,减免人民负担。光绪二十七年(1901)春,贡桑诺布尔进京会见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袁世凯,并通过袁世凯的关系延聘保定武备学堂毕业的周春芳,为其训练军队,保卫蒙旗治安,剿灭地方土匪。

光绪二十八年(1902)贡桑诺布尔创办崇正学堂,自任校长,免费招生,义务教育。第二年选拔 4 名优秀学生送入京城,专攻俄语。是年冬,东渡日本,与日本、朝鲜名流频繁接触。回国后,于光绪三十年(1904)冬,创办毓正女子学堂,改建“燕贻堂”为校址。同年冬季创办完全日本化的军事学校——守正武学堂。“文”、“武”两所学堂延聘日本教官,用日语授课,完全采用日本教育方式。这一时期,贡桑诺布尔与日本教育界、军界接触频繁,派学生留日,反映了他崇拜日本科技和注重教育的思想。

光绪三十一年(1905)冬创办《婴报》。为使当地人民与内地加强联系,尤其是让各校师生及旗民中的知识分子订阅北京出版的报章书刊,贡桑诺布尔从王府至县城(围场县的克勒沟)架设 390 华里的电杆,并设邮政代办所及电报收理处等机构,派专人负责邮政事务。与此同时,贡桑诺布尔还创办了综合性的一加工厂,内分织布、染色、造绒毡、肥皂、蜡烛、染料等部门。他开设了“三义洋行”,丰富了

人民生活,使之喀喇沁王府有“小北京”之称。在当地还开展植树养桑,加强治安,移风易俗,倡导文明结婚,兴学练兵,庶政维新,成果丰硕。

宣统元年(1909)贡桑诺布尔奉命进京,招募新兵,组建马队第三营,被钦命为“御前行走”。喀喇沁旗务则由协理希里萨拉代理。民国成立后,外蒙古哲布尊丹巴活佛称帝。贡桑诺布尔仿效欲搞内蒙古独立,被袁世凯识破,施以调虎离山之计,任命为蒙藏事务局总裁,晋爵亲王。他任蒙藏事务局总裁之职达 16 年之久(1912 ~ 1928),在任期间创办蒙藏学校,并任校长。民国初年加入同盟会,并任国民党理事会理事。北伐后,因学生反对,辞去蒙藏学校校长之职。忧郁成疾,于民国十九年(1930 或 1931)秋患脑溢血死于京郊,时年 59 岁。

这一期间,除《婴报》外,还有《蒙文报》和《蒙话报》等蒙文报纸。《蒙文报》,光绪三十三年(1907)创办于北京;主办人是蒙古喀喇沁亲王,主笔雍和宫喇嘛罗子珍;总馆在北京,内外蒙古、奉天、吉林、黑龙江等地也设有分馆;以“开通蒙人风气,以期自强”为宗旨。光绪三十三年(1907),《东方杂志》刊载了《教育·各省报界汇志》一文,上面记载了喀喇沁右旗在当时的这件盛事:“蒙古喀喇亲王近就该王府创办一蒙文报,系汇选各报译成蒙文。总管设在京师,内外蒙古及奉天、吉林、黑龙江等处均设分馆,专为开通蒙人风气,以期自强。”^[13]

《蒙话报》创办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石印出版,由吉林省政治调查局和蒙务处编译官书印刷局承印。《蒙话报》又称《吉林蒙文报》,蒙汉文对照出版,每月 15 日印刷,规格为 16cm × 24cm(据忒莫勒研究,该报的第 25 期为 23cm × 15.2cm,第 27 期为 22.2cm × 12cm)^[14]。这是现今可考的第一份由中国中央政府主办的蒙古文报纸,内蒙古图书馆存有该报纸的第 7、25、27 期。蒙古国学者戈·德力克在其《蒙文报刊史录》中介绍,前苏联列宁格勒(今俄罗斯彼得堡)亚洲研究所图书馆存有第 5 ~ 7、9、16、17 期。每期印 500 ~ 600 份,在哲里木盟各盟旗(县)向读者分送,不收费。该报《简章》中称:“以开发蒙民知识为目的,藉以疏论蒙事而宣扬上德,兼为调查各蒙旗政俗之补助……采辑各种论说暨内政外交之有关蒙古事项,以及浅近学说,足以启迪蒙民知

识者,用通行之蒙古语编演,之间亦插入图画。”该报创办时,吉林省调查局总办、学部郎中马浚年称鉴于“开通风气,莫如报纸;白话体裁尤为浅而易入……吉省东北长新一带以哲里木盟为屏藩。历来蒙旗狃于旧习,闭塞殊甚;而文字不同,更多阻力。……欲开蒙智,当从蒙文入手。”“搜集资料,参仿丛报体裁,约同局员,分类编辑。先以汉文演成白话,继以白话译成蒙语,以便蒙汉对照。取名《蒙话报》,月出一册”^[14]。

《蒙话报》设有“谕旨恭录”、“圣谕广训”、“历史”、“论丛”、“奏牍”、“时事要闻”、“浅近学说”、“吉林省城本月内银粮市价一览表”、“杂俎”、“附录”等栏目。该报是一份政治性很强的综合性报纸,颇有些政府公报的色彩,因出版周期较长,其新闻的时效性较差。其目的主要是为了劝导蒙古族同胞力行新政,树立国家观念,增强向心力,以防止俄日诸国的影响和渗透。此外,“历史”栏连载《万国近世史》,“浅近学说”栏连载《农学》,“附录”栏连载《欧美公德美谈》等,向蒙古人介绍“环球大势”、农业知识和欧美国家的民主观念以及节约时间、遵守秩序、饮食有度、礼貌待人等优良品德风尚等,以“开发蒙民知识”。

该报曾自己总结报纸的特点,体现在《本报特色》一文中:(1)市价掲載:“向来我们蒙古人购买银钱物总是受奸商的欺负,都由不知道行市的缘故,这一来他们欺骗不着了。”(2)比喻分明:“报内的比喻,都是从各国的教科书上抄下来的,于民智发达极有关系,近来内地学堂的课本里也都有的。”(3)图画工细:“报内图画,特加工细,一来使看报的喜欢他,二来使看报的容易明白。”(4)印刷精良:“本报是用石印印成的,蒙汉文双行并列,很是清楚,看报的人也不费目力。”与20世纪初出现的一些报纸比较,该报确有以下特点:第一,达到了“开发蒙民知识”的目的;第二,编排以蒙汉文双行并列,按照蒙古文排版秩序,从左至右,先写蒙古文,后写汉文,全卷一贯,一丝不苟。

该报汉文部分“文字通俗易懂,所有文字都译成汉文白话”,然而蒙古文部分的文字则一点也不“通俗易懂”。该报“先以汉文演成白话,继以白话译成蒙语”的,其翻译常常有误译或译出的一些

难以读懂的内容,如将《论蒙古实业公司之前途》一文题目,译成《蒙古真实资本的公共部门道路的南面》,译文实属难懂,不知所云。

辛亥革命以后,《蒙话报》停刊,但民国元年(1912)秋冬至民国三年(1914)年出刊^[14]。复刊并陆续停刊后,其印刷设备被东蒙书局克兴额接收。

《蒙话报》主办人为庆山、路槐卿。曾任《吉林白话报》主编的安铭^①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4月兼任该报汉文编辑。他坚持用白话文和插图以吸引读者,官署曾派人在盟旗各屯设立了讲演所,将该报作为宣讲材料,使该报为老百姓所欢迎^[15]。除安铭外,汉文编辑还有郭寿昌,蒙古文翻译依克塔春、富泰、依克通阿。

(三) 民国孕育时期《西藏白话报》

《西藏白话报》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四五月间在拉萨创办,是西藏地区最早的报纸,也是中国最早的藏文报纸,其创办人是清廷最后一位驻藏大臣联豫和帮办大臣张荫棠。《西藏白话报》以“爱国尚武开通民智”为宗旨,石印,旬报。以汉藏两种文字印刷出版,相当于现今32开刊物,单面印刷,折叠装订,计20余页。该报第一期是驻藏帮办大臣张荫棠由内地带去的一部石印机印刷出版的。为了长期印刷出版这张报纸,联豫等人还派专人到嘎里嘎达(今加尔各答)购买机器。该报主要刊发清帝诏令、驻藏大臣衙门公文和各地兴办学堂的信息,劝告藏人团结自强以抵御洋人欺侮^②。

现西藏博物馆存有一份宣统二年(1910)8月印刷的《西藏白话报》,是考察中国近代少数民族文字报刊珍贵文献。这份报纸用进口白色优质机制纸装订而成,长34.5cm,宽21.5cm,共7页。首页为封面,正中划一长方形框,框内用红蓝双色套印。上部自左至右印有蓝色的汉藏两种文字的“西藏白话报”几个字,下部正中印有红色团龙一条,四角饰云纹。方框右边为墨书汉文“宣统二年八月下旬第二十期”字样。最后一页是汉藏两文的说明,蓝色字

① 安铭(1874~1941),清末及民国时著名回族教育家、社会活动家。阿汉两通,精于英语,品学兼优。光绪三十三年(1907)4月应吉林马睿年(即马述五,任官学部郎中)之邀,赴吉林参与创办《松滨日报》,后名为《吉林白话报》,不久调任吉林政治考察局。民初积极拥护共和,民国元年(1912)参与发起中国回教俱进会的活动,任该会庶务部干部,并配合本部筹组吉林支部。

② 参见藏于扎什库伦布寺的《西藏白话报》。

迹已有些模糊,尚依稀可辨。说明是:“本报系每十日出版一本,每本藏圆一枚,每月三本,每年三十本,全年投资合藏圆三十圆。此圆日零买之价也。若定阅一年及半年者,每本减二分……”这份报纸中间5页为正文,似用钢版刻写,黑墨油印,全部为藏文行书。其内容有西藏新闻、内地新闻、国外新闻以及科技报道等15篇。此外,还介绍了开垦荒地、开辟商埠和中国手工业生产等消息和科学知识^[16]。

联豫,生卒年不详,清内务府正白旗人,原自辽东入关的老汉姓旗人,曾随薛福成出使欧洲,光绪三十一年(1905)授副都统衔,任驻藏帮办大臣,同年10月升任办事大臣。联豫多有革新之举,编练新军,改官制,铸银元,举办汉文、藏文传习所,成立印书局、初级小学、武备学堂、白话报馆等等^[16]。联豫等人认为:“与其开导以唇舌,实难家喻户晓,不如启发以俗话,自可默化于无形。”

张荫棠(?~1935)与联豫同是早期少数民族文字报刊史上政府官员办报的代表人物,广东南海人,字憩伯。他是一位颇有抱负、远见,清廉自持的官员。光绪三十一年(1905)他以副都统衔任驻藏帮办大臣,入藏查办事件,参劾有泰等人昏庸误国。第二年与联豫共同创办《西藏白话报》;同时向清外务部陈《治藏刍议》(19条),其中第7条和第14条分别写道:“广设汉文学堂,使通祖国语言文字,兼习算学,兵式体操,教习均用南北洋蜀粤陆军毕业生。3年后兼习英文,6年毕业。藏中所有官兵均由此送。”“设汉藏文白话旬报;派送各地,以激发其爱国心,而进以新知识。”随后又在藏颁发《训俗浅言》、《藏俗改良》,命令噶厦设立九局,行新政。遗著有《西藏奏牍》5卷。

联豫与张荫棠都曾出使过欧美,通晓洋务,并且具有一定的爱国主义思想。这也恰恰是联、张二人共同创办《西藏白话报》的思想基础。联豫和张荫棠驻藏期间,试图对西藏的社会制度作更深入广泛的改革。其出发点无疑是巩固清朝中央政府对西藏的主权,加强边防建设,防止和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犯。尽管许多好的措施最终因清朝腐败而没能付诸实施,但这些主张给西藏人民留下了深刻印象。作为政府官员办报的典型,他们的政治思想和办报观点在当时来说,都是较为先进的。在那个风云变化

的时代背景下,他们的历史功绩不可磨灭。

《西藏白话报》断断续续出版时间不到4年,每期发行300~400份,深受广大藏族同胞欢迎。清帝退位之后,这张报纸也就终止了。该报的创办标志着西藏也是中国藏族新闻传播事业由原始的新闻传播活动直接跨入近代报刊时代,它是西藏近代传媒中唯一的一种较为成熟的新闻传媒,在中国新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四) 民国孕育时期的朝鲜文报刊

朝鲜族经历了三百多年的时间,从鸭绿江、图们江以南的朝鲜半岛迁徙到中国东北地区,逐渐形成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17世纪初,已有朝鲜难民向中国东北地区开始迁徙了。道光二十年(1840)以后,朝鲜政治衰败,国库枯竭,加上朝鲜北部连续10年发生了空前的大水灾、旱灾和虫灾,举国上下因饥寒而死难者难以计数。朝鲜难民纷纷涌入中国东北境内。当时的中国已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清朝政府和朝鲜政府均未彻底阻止朝鲜难民“潜入”中国东北地区。清朝地方官吏或出于同情或出于无奈,默认朝鲜难民筑室私垦。19世纪70年代后期,清朝政府废除封禁令,实行移民实边政策,允许朝鲜边民大量迁入中国东北境内。光绪九年(1883)3月,清朝政府同朝鲜政府签订了《奉天东边民交易章程》,不仅促进了两国边民的贸易交往,而且拓宽了朝鲜平民迁入东北的途径,迁入中国的朝鲜平民人数因而与日俱增。延边是朝鲜平民最为集中的地区。据统计,宣统二年(1910)9月至宣统三年(1911)年末,迁入延边定居者已达到19000多人。历年频繁的迁徙和经常性的交往,使得朝鲜平民同中国东北的满、汉等民族形成了大杂居、小聚居、互相交错居住的局面,他们在开发东北以及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并逐渐发展成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朝鲜族。朝鲜族绝大多数使用朝鲜语文。朝鲜族文化比较发达。

1. 《月报》

《月报》是中国最早的朝鲜文杂志,是延吉垦民教育会于宣统元年(1909)创办。宗旨是向朝鲜族人民群众进行反日启蒙教育。宣统二年(1910)日本帝国主义入侵朝鲜,激起了延边朝鲜族居住区的反日情绪,这也是推动朝鲜族新闻事业发展的重要

因素。为了建立反日民族独立运动基地,具有反日思想的民族主义者和知识分子在朝鲜族聚居地建立了各种反日学术团体。李同春、金立等是当时著名的反日知识分子,在局子街开设光成讲习所,以培养具有独立意识的人才。民国元年(1912),他们为摆脱殖民统治,依靠中国政府开展反日民族解放运动,代表万户朝鲜人向北京政府申请归化入籍。李同春等人创立垦民教育会的目的之一就是研究中国的教育和法律,学习汉语,改善和发展朝鲜民族的教育。垦民教育会的扩大,进一步加强了杂居区朝鲜族人民之间的联系。

2.《大成团报》

垦民教育会在宣统二年(1910)7月1日创办。《大成团报》的发起人、创办人是李同春、朴昌善等23人。该报的宗旨是:“为华韩舆论之代表作社会教育之源泉,为劝善惩恶之机关作忠言善导之神圣,为政客之顾问作社会之师表,为良民之福音浚吏之阎王,有害我同胞者以正义公道诛之斥之,有警我同胞者以暮鼓晨钟,鸣之醒之,有政策之失轨者面诘廷争誓死不屈,由社会之腐败者必显净微讽迁善,乃以海外之政策随时电闻,地方之民情无漏日载,俨然一国之干城,超然作独步之风雷。”该报旨在评论近代政治、批判旧文化、主张正义公道、斥责贪官,也宣传反日救国思想及惩恶扬善和改良社会风气、鼓舞产业开发和振兴教育、主张法律公平和政治改善。该报主要内容有:论说、小说、演说、教育扩张、产业开发、政治改善、法律公平、历史地理、内报外报、官报杂报。该报刊载内容广泛,涉及政治、经济、教育、法律、历史、地理、国内外时事及地方新闻等。

3.《韩族新闻》

朝鲜沦陷后,朝鲜民族独立运动者在西间岛成立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学术团体,并创办了《韩族新闻》。宣统三年(1911)4月,李始荣、李东宁等民族主义人士在柳河县三元浦大孤山主持召开垦民会议,决定创立耕学社,由李相龙任第一任社长同时创办《韩族新闻》。耕学社把生计和教育视为反对日本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养精蓄锐的两大武器。他们以开发实业、振兴教育为中心任务,组织群众开荒种地,进行军事训练,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自动解散。1912年在柳河县成立了扶民团。扶

民团继承了耕学社的宗旨和纲领,在此基础上发展成为具有朝鲜族自治性质的团体,并在各地设立中小学,发展教育事业,创立新兴学校。后来,扶民团本部和新兴学校迁往通化县哈尼河。

耕学社、扶民团、新兴学友团等创办的《韩族新闻》旨在评论时局,揭露日本侵略罪行,宣传民族独立和民族革命思想,于介绍近代文化和启蒙教育事业,为促进民族的觉醒和团结发挥了很大作用。

(五)民国孕育时期的维吾尔文报纸《伊犁白话报》

19世纪的中国处在水深火热之中,随着内地反帝反封建斗争形式的不断高涨,资产阶级革命派将目光投向西北,杨缵绪、冯特民、冯大树等同盟会成员纷纷从内地来到新疆,成为革命活动的先驱。当时伊犁将军府要创办新军,清政府从湖北新军中抽调一营,作为同盟会成员的杨缵绪时任湖北陆军四十二标统带,奉清政府命令调任伊犁陆军协统,光绪三十四年(1908)率湖北新军近500人进疆,革命党人冯特民、冯大树等加入军中,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7月他们抵达伊犁。革命党人到伊犁后,积极开展革命活动,联络社会各阶层人民;同时沿用内地革命斗争的宣传形式,创办了《伊犁白话报》,作为同盟会在伊犁的宣传机关报。《伊犁白话报》的创办成为新疆近代新闻事业的开端。

《伊犁白话报》是中国新疆地区的第一份少数民族文字报纸,创刊于宣统元年(1910)3月25日,社址设在新疆伊犁地区惠远城北大街(今霍城县猛进乡)。冯特民任主编,主要撰稿人有冯大树、李辅黄、郝可权、郑方鲁、张愚生等。他们都是在宣统元年(1910)前后随同新军协统杨缵绪从湖北调到新疆的湖北籍同盟会会员。

冯特民(?~1912)湖北江夏人,名一,原名超,字远村,笔名鲜民,曾游学海外,“工书能文”,思想活跃,笔锋犀利,曾任《申报》记者。光绪三十一年(1905)他与张汉杰等在武汉接办《楚报》,“纵论鄂省政治,不避嫌疑”,因刊张之洞与英人密订《粤汉铁路借款合同》的全文并配发评论而遭严禁,本人逃往新疆。光绪三十四年(1908)7月与杨缵绪带领的部队,来到惠远城驻地,任书记官,积极倡导革命,此后他加入同盟会。宣统二年(1910),他创办《伊

犁白话报》，宣传革命思想，使《伊犁白话报》成为辛亥革命时期新疆地区最有影响的报纸。民国元年（1912）冯特民被马腾宵刺杀于惠远城。

《伊犁白话报》的创办与曾任伊犁将军的长庚有密切关系。长庚喜读《大公报》，在《伊犁白话报》创办时，他通过英敛之从《大公报》请来两位排版、印刷师傅，具体帮助该报的编采出版事宜。阿力侃·定升的祖父负责过该报的满文版。

从现存的《伊犁白话报》第21号报纸可知，这是一张4开小报。报头《伊犁白话报》5个大字为楷体，木刻，排字格式自右向左，报头右边是3种日历并行的，即第一排“大清宣统二年三月初五日”，第二排“俄历一千九百十年四月一号”，第三排“西历一千九百十年四月十四号”；下面印有“星期四”和“清真礼拜六”及“已酉上斗执日”，“寒暑表昨日平均六十三度”等字样。报头左边是“本报价目”（每张零售制钱十文订看一月制钱三百文半年制钱一千六百文全年制钱三千文外埠订阅每月纹银三钱常年三两邮费），另加“告白刊例”、“代派处”等等。

该报设有“摘登来函”、“转载专件”、“演说”、“爱国话历史”、“本省新闻”、“译报”、“杂俎与闲评”等7个栏目，报道新疆各族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维护国家统一的各种消息。它通过“爱国话历史”专栏，编发了各族人民爱国活动的真人真事，大声疾呼筹还国债、收回主权，喊出了伊犁“要争各省之先步”的雄壮口号。对于沙俄制造边境事端、节外生枝地要求“会约定界”的挑衅行为，该报站在国家和各族人民的立场上大造舆论，敦促伊犁当局拒绝沙俄重新定界的无理要求；同时对沙俄不断扩大经济侵略、控制新疆财政金融、偷运鸦片的罪行予以无情揭露。冯特民等报社领导人怀着高度的爱国热情，在清朝政府一再妥协投降的形势下，喊出了中华民族的呼声，为粉碎沙俄侵占中国领土的阴谋做出了贡献。

《伊犁白话报》重视广告刊登与宣传。它设有“告白”、“来函照登”、“鸣冤”等栏目。该报还在中缝和重要版面刊登商业广告，从侧面反映了辛亥革命时期惠远城的社会生活变化。比如宣统二年（1910）4月14日的报纸就在头版刊载两则广告：一是《京都新调名医》：是惠远城北街会芳园内新开奇

珍照相馆告白，后一则广告在23号报纸的一版和中缝又连续刊登。这可能是伊犁地区有史以来的第一家照相馆，广告中详细列出所照相片大小和加洗多少的价目表，从“电光放大”的字样中可以看出惠远城已有发电设备。该报内容丰富、文字新鲜活泼，深受读者欢迎：除在新疆发行外，还远销北京、天津、上海、汉口等地，设有宁远官盐局、绥定文丰泰、霍尔果斯、新疆官报局，以及塔城、北京爱国报馆、天津大公报馆、上海时报馆、汉口中西日报馆等代派处。其影响之广，印数之多，在当时少数民族文字报纸中首屈一指。宣统三年（1911）11月因“讥弹时事，语涉诞谬”，被时任伊犁将军的志锐勒令停刊。

《伊犁白话报》用汉、维、蒙、满4种文字出版，汉文为铅印，满、蒙古、维吾尔等文字为油印。这张报纸除宣传同盟会的纲领外，还向少数民族同胞进行民族民主革命教育，号召他们与全国人民一道反对清朝封建独裁统治。由于报纸的宣传，新疆地区的同盟会会员日益增多，许多少数民族同胞积极投身于革命。诚如当年伊犁炮队的邓德龙排长所说：“贵报关于国计民瘼，公害公益之事，语语痛切，实足以振聩起聋，开通民智者矣。”^①当时伊犁地区生活着维吾尔族、回族，还有游牧的哈萨克族、蒙古族。《伊犁白话报》面向各少数民族进行反压迫宣传。民国元年（1912）1月的伊犁起义能够得到少数民族的支持，与《伊犁白话报》的宣传鼓动是分不开的。

三、民国孕育时期外国人在海内外创办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报纸

众所周知，近代史上最早的汉文报纸是由外国人在海外创办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同样，近代史上最早的少数民族文字报纸——《东陲生活》也是由外国人于光绪三十一至三十三年（1895～1897）间在今俄罗斯赤塔市出版发行的，又译为《东方边疆生活》。

（一）《东陲生活》

《东陲生活》以蒙、汉、俄3种文字印刷。周五刊，共出版450多期。经费主要由沙俄政府提供。该报主办人巴德玛耶夫（1851～1919），俄籍布利亚

^① 参见该报第21号《来函照登》。

特蒙古人,曾以蒙藏专家身份任职于俄国外交部亚洲司。光绪十九年(1893)2月,他向亚历山大三世呈递奏章,即所谓“巴德玛耶夫计划”,企图吞并蒙古、西藏乃至全中国。

《东陲生活》是“巴德玛耶夫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张报纸以刊登俄罗斯帝国的法令、制度、公文及官方活动为主,还有国际新闻、东方见闻和各种趣闻轶事等。其多是俄罗斯各报纸文章的译文,也有该报记者采访的新闻和地方报纸内容的选译,包括漠南、漠北、汉蒙地区的新闻报道。其主要内容有:第一,俄国沙皇皇宫及政府公报;第二,从俄国电报中心发来的消息;第三,东部边疆风土及地方见闻;第四,东方邻国、主要是中国的报道;第五,奇珍异闻;第六,广告等。其主要是通过俄罗斯商务机构及其商人在库伦和蒙古西部地区发行。

有学者认为这是中国最早的一张少数民族文字报纸。我们认为,从其创办人、创办地点、办报宗旨、读者对象、发行范围等方面看,《东陲生活》不能称作中国少数民族文字的报纸,只能说是由外国人在海外创办的蒙古文报纸,虽然它先于《婴报》八九年之前就已问世了。

(二)《蒙古新闻》

民国创立前,在中国境内由外国人创办的蒙古文报纸有《蒙古新闻》。

《蒙古新闻》宣统元年(1909)5月创办于哈尔滨。蒙古文铅印,规格为32cm×16cm,半月报,后来改成55cm×44cm规格的周报,每期30~80页。民国七年(1918)12月终刊。该报由俄罗斯远东铁路局主办,哈尔滨远东报社出版。由蒙古国籍的海山组织创办,中期由查唐·伊希主持,后期被逃往中国的白俄所操控。《蒙古新闻》从内外蒙古、布利雅特蒙古等地召集了一批有影响的学者,其中来自内蒙古的有海山、阿拉木斯敖其尔等;来自外蒙古的有巴达胡巴特尔等。这是现今可考的第一份由外国人在中国境内创办的蒙古文报纸。

《蒙古新闻》办报宗旨为:“迅速开启蒙古民智,协助建立一套能操控自己政治的法律体系以及众蒙古能够繁荣富强。”设“首论”、“评论文”、“库伦消息”、“蒙古新闻”、“在中国”、“在俄罗斯”、“在满洲里”、“世界新闻”、“电报”等栏目,后来又增设了

“要闻”、“俄罗斯古代史纲”、“欧洲大战”等栏目。该报依靠先进的技术条件及记者发来的源源不断的消息,完成了由以评论为主的政论文体向以报道性新闻文体转变。其风格与今天的时事性周报相似,内容以时事报道为主,体裁与形式类似于今天的消息,以简讯为主。

《蒙古新闻》的主要消息来源有两个:一是由俄文出版物翻译或从俄国或中国的电报中心获取;二是派记者到各地采访撰写。据现有资料可知,《蒙古新闻》外派记者之举是蒙古族新闻史上的首例。报社当时已使用世界最先进的印刷设备:用电话从西方通讯社获取消息;电动印刷机的使用大大提高了报纸的时效性;应用照片、铅印等。发行范围也较为广泛,基本上覆盖了内蒙古、外蒙古、布里雅特等地区。与同期报纸相比较,它出版时间最长。宣统二年(1910)秋清政府颁发官方文件,明令内蒙古地区不准传阅、保存《蒙古新闻》。《蒙古新闻》就此停刊^[17-19]。

四、结语

综上,我们从3个方面阐释了民国孕育时期的少数民族新闻业:少数民族报人的办报活动;少数民族文字报刊的兴起以及外国人在海内外创办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报纸。报纸与报人密不可分,办报是少数民族报人最主要也是最基本的新闻活动;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报人的办报思想、经营理念推动了少数民族报纸的兴起和发展。少数民族报纸都是由从事这一事业的报人创造的。我们没有把少数民族报人的办报活动肇始之年作为少数民族报业兴起的年代,是因为他们所办的报纸并不是少数民族(文字)报纸;《婴报》创办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是中国最早的蒙古文报纸,也是中国最早的少数民族文字报纸,这才是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事业肇始之年。有了这样认识,也就不难理解外国人创办于俄罗斯赤塔的蒙古文报纸《东陲生活》,虽然早于《婴报》,我们却把它放在第三部分论述的原因了。

倪延年教授把光绪十九年(1893)7月至民国元年(1912)划为中华民国孕育时期是一种独特的历史分期,我们支持这一说法,并用此说法撰写中国少

数民族新闻史。我们这篇文章也是对这一历史分期的尝试,也可算是一个例证。

参考文献:

- [1] 英敛之. 论新闻纸之势力[N]. 大公报,1980-08-24.
- [2] 英敛之. 原报[N]. 大公报,1912-06-22.
- [3] 方汉奇. 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1卷[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 [4] 张佳生. 中国满族通论[M]. 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5.
- [5] 胡绳.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 [6] 方汉奇. 中国近代报刊史[M]. 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81.
- [7] 刘晴波. 杨度集[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 [8] 郭双林,王续添. 中国近代读本[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 [9] 孙静,李世举. 大同报与晚清满汉融合思想[J]. 新闻爱好者,2010(19):80-81.
- [10] 方汉奇. 中国近代报刊史[M]. 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81.
- [11] 房全忠. 中国回族概览[M].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
- [12] 留东清真教育会. 醒回篇[M]. 王希隆,校注. 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87.
- [13] 罗韦. 开通风气·以期自强:辛亥革命爆发前民族地区的舆论总动员[N]. 中国民族报,2011-04-22(7).
- [14] 忒莫勒.《蒙话报》研究[J]. 蒙古学信息,2001(3):23-27.
- [15] 黑龙江日报社新闻志编辑部. 东北新闻史[M].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1.
- [16] 吴丰培. 联豫驻藏奏稿[M]. 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79.
- [17] 白润生. 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报刊史纲[M].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
- [18] 白润生. 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M].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
- [19] 白润生. 守护好我们的精神家园[M]. 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4.

Ethnic minority press of preparatory period in the tim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BAI Run-sheng, JING Yan-qing

(School of Literature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18, China)

Abstract: In 1890s, the reform movement emerged and gradually became active, and the bourgeois reformists set off the first high tide for the newspaper running. Influenced by this trend, many minority newspapermen also devoted themselves to the culture movement, which brought about the production and booming of the minority journalism at that time. This paper studied the ethnic minority press of preparatory period in the tim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from three aspects, namely, journalistic activities of minority newspapermen, the minority press and the press published in minority's languages. It shows that these different minority presses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minority journalism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Key words: the Republic of China; ethnic minority; journalism; minority newspaperman; minority press; press published in minority's language